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读书》编辑部编

Dushu

旧锦翻新样

《读书》文化艺术评论精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读书》编辑部 编

旧锦翻新样

《读书》文化艺术评论精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旧锦翻新样：《读书》文化艺术评论精粹／《读书》编辑部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ISBN 978-7-108-03799-2

I. ①旧… II. ①读…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0641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4.375

字 数 36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5.00元

出版前言

由我国老一辈出版界、文化界人士创办的《读书》杂志，迄今已走过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自创刊伊始，《读书》即以继承中国知识人的淑世情怀和传统自任，以思想开放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

作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丰富多样的知性与感性生活，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较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而杂志的终极目标，则是致力于形成一个以相互批评、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为特色的知识分子文化。

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章传统，用形象、生动、活泼的文字风格写作，注意提升思想文化的品位与鉴赏力。由于创办《读书》杂志的前辈们，努力倡导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高度重视杂志的文体风格，那种文理并茂、形式与内容俱佳的写作风格，曾给知识界留下了经久不灭的深刻印象，在这一文体风格的背后，不仅

仅只是文风活泼、讲究趣味而已，而是东西方文化早从古典时代就已发萌的关于博雅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理想。从古罗马人的“自由七艺”到古代儒家的“六艺”，用马克思平生最珍爱的西塞罗的格言来说，就是“人所具有的我都不陌生”。时代在演进，社会在变迁，但无论人类在知识上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学术文化方面的分工如何日益专门细密，这一人文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过时。

为了追求这一人文理想，《读书》杂志努力展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思想文化不仅仅是用作抽象思辨的学术概念，也具体体现在包括文学、艺术、影视、戏剧、美术、建筑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门类之中，因此创刊三十年来，她也不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以不断扩张读书界的文化视野。

《读书》杂志重视广义的以谈书品书为主题的文章。长期以来努力发挥书评刊物的积极引导作用，品评月旦，择优汰劣，在为读者筛选和过滤信息、提供可靠的购书和阅读指南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公信力。

《读书》创刊的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感情律动。

在《读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三十年来的已刊文章中选择精粹，依循杂志自身的风格特征，按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人书话、笔谈、美文五个门类共六册编辑成书，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是答谢那些在三十年间始终不渝支持我们工作的读书界的朋友们。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1
《简·爱》	朱 虹 1
看“星星美展”，漫谈艺术形式	吴甲丰 11
西画东渐二三事	朱伯雄 19
读画记	黄 裳 26
丹尼尔·贝尔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批评	赵一凡 33
电视：文学批评的新媒介	郭宏安 46
现代“文人”	张旭东 56
人体艺术联想	孙 津 66
前卫艺术与文化现实	高名潞 唐庆年 范迪安 周 彦 72
耐人寻味的中国味	辛丰年 81
一篇《锦瑟》解人难	王 蒙 86
须从旧锦翻新样	夏晓虹 95
人之相知之难也	汪曾祺 97
也与武侠小说结缘	陈平原 101
回忆未来	刘承军 108

漫画文化的日本	李长声	114
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	陈志华	121
丑闻也成畅销书	吴岳添	131
香港的文学和消费文学	柳 苏	135
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	145
西方文化的“不育症”	申慧辉	156
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	王 林	161
记恋冬妮娅	刘小枫	166
一只色彩斑斓的牛虻	李 陀	178
柏林电影节的这道风景	吴文光	188
他们的历史	杨小彦	195
五月的鲜花	李 皖	203
被提升的恶作剧	王瑞芸	211
录影力量	崔卫平	221
逼视的眼神	张承志	232
“普利兹克奖”、伍重与《营造法式》	赵 辰	240
十字路口的台湾电影	李政亮	248
战争的影像	顾 铮	258
塑造婚姻	吴雪杉	267

身体对文学的反抗	傅 谨	278
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吕新雨	289
气味、仪式的装置	刘 禾	302
我的心在先秦	马悦然 欧阳江河	311
樱井大造与帐篷剧场	陶 子	324
电影中的冷战	王 炎	334
改变“观看”的方式	赵汀阳	347
美术史与美术馆	巫 鸿	352
设计为人民服务	周 博	363
刘庆元木刻的抒情性	黄灿然	371
现状的无奈	郑洞天	377
台上的“我们”，台下的我们	黄纪苏	385
关于《地书》	徐 冰	398
自由主义与公共艺术	黄 专 隋建国 邱志杰	404
大剧院的半个世纪	曾昭奋	416
什么是诗歌精神？	杨 炼	426
村里的童年越来越少	柳冬妩	432
百年功罪谁论说	张钦楠	441

《简·爱》

——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朱 虹

长期以来，在《简·爱》的评论中，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只有小说开头关于慈善学校的部分是有意义的，因为它“反映现实”、“暴露黑暗”，而其余则都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列，应予批判等等。我自己多少也曾是这样看的。

现在仔细想想，不是没有问题。我们不妨用这种“反映现实”的标准来检验一下《简·爱》，看看有多少可以肯定的东西。我们会发现，按这个尺子去量，剩下来合格的东西不多了。其一，简·爱在罗伍德学校的部分反映了资产者心肠的冷酷、慈善机关内部的腐败以及宗教界上层分子的伪善等等。其二，关于罗契斯特先生和他的庄园的描写反映了十九世纪初年贵族在乡村拥有的权势与声望；围绕着他的婚事的纠葛还反映了有产者家族内部的利害冲突，因为他是为财产关系才被蒙骗与有遗传性精神病的女人结婚的。其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世态炎凉，有的从正面写，如布兰希小姐听说罗契斯特的财产已经耗尽，府邸只是一副空架子，心就凉了，态度也变了；有的是侧面提到的，如简·爱的母亲嫁了她爱的穷牧师就被赶出家门。其四，罗契斯特的父兄等辈在西印度群岛发了财，简·爱的叔叔给她留下的两万

镑也是在那里赚得的，这当然是不意之中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掠夺的一个小小见证。其五，里弗斯要去印度传教、在乡村办小学等则说明教会的影响，等等，等等。总之，如果要这样去找，《简·爱》一书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似乎也不少。甚至还有一句话提到“镇压骚乱者的部队”，指世纪之初的破坏机器运动。

毫无疑问，《简·爱》对当时英国社会这一类的反映还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特别是关于学校的一段，是根据作者亲身的经历，以她所住过的慈善学校为原型，生动、逼真，凝聚了作者对那个卑琐的环境中为所欲为的小暴君的极端鄙夷与仇恨，书出版后，当地人都认出了其中所指，拍手称快。

但是，毕竟作为对学校、对慈善机关的揭露，不及狄更斯在《尼古拉·尼古尔贝》、《奥列佛·特威斯特》中来得那样淋漓尽致。关于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婚姻市场上的无耻交易，又要数萨克雷的讽刺切中要害。若单论这些方面的成就，《简·爱》是望尘莫及的。至于其他的所谓现实主义成分，在作品中只能算是旁敲侧击、细枝末节，还不是作品的有机内容，孤立地看，没有多少分量。不难看出，如果这本小说不是写出了简·爱这个人物，所有这一切，就缺少一个灵魂，它们就不能统一成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这本小说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全书没有哪一部分能脱离简·爱的形象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就以罗伍德学校那一段来说，若不是为表现简·爱性格中自幼便形成的反叛特点，那么，关于校长先生种种丑态的描写并不比通俗小说中的手法高明许多，远不足以构成《简·爱》一书的精华部分。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类描写具备了历史文献的价值，请问，我们直接求助于史书岂不更好？当然我们不否认文艺作品的认识

价值，但怎样理解这种认识价值本身又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把优秀的外国古典文艺仅仅当作历史图解，那么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有多少新的现象需要我们去认识，多少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我们抱住勃朗特等作家去了解资本主义，够用吗？更何况，这种批评方法如果流传下去，外国文学评论的路子不是会越走越窄吗？

归根结蒂，《简·爱》一书的主体和真正价值，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还是关于女主人公简·爱一生的故事。如果贬低简·爱的形象而只看重其他部分，那就无异于《汉姆雷特》一剧少了丹麦王子。

现在，我们如果调转角度，不是首先抓住对社会现象的零星暴露和影射，而是从女主人公的一生与性格的角度来看，那么《简·爱》一书的全貌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有读者提出过《简·爱》的社会背景问题。《简·爱》一八四七年第一次出版。一八四八年连续再版两次。一八四八年前后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革命、巴黎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议会改革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而《简·爱》除了关于镇压骚乱的一句话以外，全书中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简直麻木不仁。说来说去，它就是一部关于孤女简·爱一生的故事，根本没有试图涉及重大题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平凡的故事偏偏成为历史社会的典型产物——通过一个妇女的命运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发出了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远没有获得平等权利。就是宪章运动也没有提出男女平等问题。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温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葛德温的《为女权一辩》出版后就得不到承认。当时妇女

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她的财产在结婚之后自动归丈夫支配，只有到十九世纪后期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案”，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善。远在易卜生之前，狄更斯的女主人公早就发出了“我不能在玩具房子里当玩偶”的呼声。新兴的工业化大城市吸收了社会底层的妇女劳动力，其中熬不过那非人劳动条件的就沦落为娼，伦敦夜晚的街道“响彻着妓女的诅咒”。有文化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也很成问题。她们没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到工厂做工又有失身份，教书、当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职业维持着薄薄的一层体面的面纱，实际的地位待遇与女仆所差无几。《雪尔莉》中的一个人物提出来要去作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发疯了，可见非不得已已是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勃朗特姐妹先后都为生活所迫当过家庭教师，她们的书信中有不少关于这种悲苦生活的记载。我们从这些信中看到，受苦受累之外，最难忍的是那屈辱、单调、孤独（夏绿蒂一八四三年三月一日的信）。这些女孩子只身在外，在陌生的环境里所看见的脸面都是那样“冷酷、阴郁、枯燥”（一八四七年一月二八日的信）。作者的妹妹艾米莉愤慨地写到“私人教师除了该她干的那些劳累的活计外，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一八三九年六月八日的信）。不言而喻，《简·爱》中的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凝聚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经过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

《简·爱》前后的英国小说有许多都涉及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问题，在处理方法上各有千秋，对比之下，《简·爱》的特点就更加鲜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中篇小说《巴拿马之行》着重心理描写，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只身乘轮船去巴拿马，准备

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富翁，作者微妙地写出了她从心理到生理上对这桩婚姻的反感，表现出这种肉体的买卖对妇女精神上的折磨。萨克雷笔下的利培加把当女教师作为打入上流社会以待进一步见机行事的阶梯，而作者又借她的活动暴露那个社会。至于擅长描写妇女形象的奥斯汀则往往对她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做喜剧性处理，使她们都巧妙地避免了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

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简·爱》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正面对这类妇女的地位处境中的一切不合理做了高度集中的概括，并通过她对安排了这种命运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小说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要突出的是简·爱自幼以来的反抗精神。她从寄居舅妈家时候起就用严厉批判的眼光看待舅妈一家人的为人行事，对他们的虐待与欺辱充满了仇恨，以超过她的年龄的敏锐和洞察识破长辈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卑劣用心；第四章写她在离开舅妈家的前夕，有了一次大爆发，尽管她弱小，无人保护，还是不顾一切地痛陈里德太太对她干下的种种亏心事，使得那位有钱有势的太太竟然害怕起来，而简·爱自己却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复仇的喜悦、突然感到灵魂进入了一个新奇的自由的境界。简·爱性格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关于慈善学校的一段描写继续展示简·爱的性格。现在她更成熟了。她用利剑一样的目光审判着慈善学校日常生活中种种欺弱怕硬的丑恶行为，特别从道义上鄙视那个贪婪、伪善，以虐待孤儿为营生的卑鄙的小暴君布洛克尔哈斯特校长。简·爱的幼年 and 少年都是在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生长的，而她“什么也不忘记，什么都不宽恕”！

在简·爱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着重描写她的精神世界，

她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如果说《简·爱》带有自传性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部内心生活的自传。简·爱的“灵魂像一团火”，她的性格“不屈不挠”。像她这样一个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富于幻想的少女，被命运抛到那样一种环境，千百种的不公平，她的敏感的神经尤其不能容忍。通过做梦、作画，我们还看到，她那要迸发出来的郁愤简直有如暴风雨前的滚滚乌云；有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她的幻想又凝结为人间没有见过的形状和色彩。《简·爱》的这些部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

受不了慈善学校里的压抑，简·爱辞去了教职改到桑费尔德庄园去做家庭教师。由于自幼以来就是处在敌对的环境里，简·爱到桑费尔德后采取的姿态是矜持的、防卫的。她不暴露自己的内心，怕它受伤，倒是随时准备对付外来的攻击。罗契斯特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尽管地位和境遇与简·爱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在愤世嫉俗这点上与简·爱渐渐地、渐渐地，经过多次尝试，达到共鸣。

下一个步骤便是报复。人们很容易看出《呼啸山庄》中的报复，因为它交织在情节里；而往往忽略贯穿在《简·爱》整个构思中的报复心理。如我们所看到的，夏绿蒂·勃朗特在关于慈善学校的那一段描写里就对当年虐待过勃朗特姐妹的“鹿头学校”给予了永久的宣判与定罪。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报复。而在简·爱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却通过自己心爱的人物简·爱对整个上流社会进行了阶级的复仇。毫无疑问，罗契斯特先生举行舞会那一场戏是全书的高潮。在那豪华的场面里，身材瘦小、穿着寒酸的简·爱被那些傲慢的太太小姐们任意奚落，但这段描写绝不是简单地为家庭教师鸣不平。作者的真正用心，是在于以此烘托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即罗契斯特向简·爱正式求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对罗契斯特来说，等于社交上

的自杀行为。客厅里的一幕用很多笔墨刻画布兰施小姐，她有门第、财富、美貌和教养，而且显然倾心于罗契斯特。在天秤的另一头则是一无所有的简·爱。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突出罗契斯特的决定的不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还不过是那个具有永久魅力的灰姑娘故事的十九世纪翻版罢了。这种处理，夏绿蒂·勃朗特实际上是在艺术的王国里对于在她当家庭教师期间一向蔑视她、欺负她的东家太太小姐们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报复，在她们的世袭领地彻底战胜了她们。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关键在于简·爱怎样取得了胜利。作者留下了确凿可靠的材料说明她有意把简·爱写得“跟自己一样瘦小，没有姿色，但依然迷人”（见哈里叶特·马丁诺一八五五年的悼念），这样，简·爱的胜利就更加彻底，她凭自己的人格美、精神吸引力一举把那些浓妆艳抹的贵族小姐赶出竞技场，把她们炫耀的虚荣浮华统统踩在脚下。舞会这一幕不仅是故事的高潮，而且是全书的精华，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提出了人格和精神美的问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一个角色，跟简·爱一样贫穷孤苦的少女吉恩，也是在当家庭女教师时迷住了一位资产阶级大少爷，结了一门好亲事。只不过，她是凭着在自己身上培植资产阶级小姐的教养和派头而赢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她承认了并遵守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相比之下，简·爱的形象中所概括的对资产阶级精神价值的批判就更加鲜明。

在达到舞会那一场戏的高潮后，一个平庸的作家只能来个急刹车，让故事在庆祝婚礼的教堂钟声中结束。但是夏绿蒂·勃朗特有勇气打乱自己好不容易建成的如意布局，让简·爱从优胜者的

欢乐再度陷入痛苦与绝望。这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对简·爱的反击。罗契斯特先生有发妻，简·爱被推回到她原来的地位，只能作不被社会承认的情妇。但是，正如罗契斯特所说——她“反叛命运的安排，要与我平起平坐”。简·爱只身逃难，几乎沦为路边饿殍，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简·爱命运中的这一起一落，她的反叛性格塑造得更完满、更丰富了。人们提起反叛性格，好像非得有于连的一番作为或恰尔德·哈罗尔德的一副姿态才合格。其实，叛逆性格，关键还在于“性格”。英国社会的发展和英国小说的发展的许多条件促成简·爱这个平凡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高度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反叛精神，通过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的空虚和虚假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抨击。夏绿蒂·勃朗特创造了英国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新就新在这里。

《简·爱》出版之后，“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测匿名的作者是谁”（《书信集》第二卷，第228页，艾伦·挪西信）。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攻击，被指责为“不敬神的”、“邪恶的”、“奸诈的”、“造作的”（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权威性的《每季评论》（一八四八年，十二月号）攻击它“趣味粗俗”、“推崇异端”，说它是一部“反对上天……对贫富的安排”的“反基督教”的作品，指出“正是在滋养了宪章运动的那种思想情绪的推动下才写出了《简·爱》这样的书”。而另一家《基督教提醒者》（一八四八年，四月号）说得更简洁明了：“《简·爱》通篇燃烧着道德的雅可宾主义。”《简·爱》一书的基本倾向如何，这些评论是最好的见证。

在《简·爱》问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压在社会底层的英国工农群众在文学上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产生出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用文艺的武器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彻底

的讨伐，宪章派文学实际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在当时，两部最重要的反映工人阶级状况与呼声的作品《塞比尔，或两个民族》和《玛丽·巴顿——曼彻斯特生活的故事》，分别是由保守派贵族狄斯累里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的传教师太太盖斯凯文夫人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没有文化的买卖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教会倒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当时安利干教的牧师，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而其社会地位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掌握文化，另一方面具有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十九世纪许多作家都是产生于这个社会阶层绝非偶然，《简·爱》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抗议在文艺上的结晶。

夏绿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写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严的不可辱不可犯，深邃激越地控诉了践踏人的价值、浪费人的生命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传播了这种朦胧的意识，在只认现金交易的资产阶级哲学之外，天地间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更值得人们尊重。归结蒂，这是西欧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继续。过去有过一种认识，笔者本人也不例外，以为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就能有效地把它打发掉。其实，如果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文艺上还沉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的时候，简·爱式的抗议确实起到抨击现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战斗作用，尽管那种秩序还正在发展当中。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简·爱的精神概括为推崇人格、鄙视和反抗一切仗势欺人、道德伪善、趋炎附势、妄自尊大等任何阶级社会都会产生的卑劣心理，那么显然，这种精神在产生《简·爱》这部作品的时代过去之后也还是有意义的。